

1990s 末以来成都市文化空间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1}

刘润^{1,2} 杨永春³ 任晓蕾⁴

(1.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中国湖北武汉 430062;

2. 区域开发与环境影响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中国湖北武汉 430062;

3.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中国甘肃兰州 730000;

4.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中国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1990 年代末以来, 文化空间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空间的重要构成, 且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的变化特征。为探析这一变化情况, 以成都市为例, 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①文化空间类型增多, 功能日益复合, 区位选择的市场化与政策引导趋势逐渐增强, 文化空间由市中心向城郊阶段性扩张, 但存在类型与区域上的差异。②文化空间主体多元化, 空间构建方式日趋个性化, 开发模式呈现出专业化、节事化与网络化开发的态势。在此基础上, 继续探讨了文化空间变化的驱动机制, 即制度转型通过改变文化空间发展的主体、改变主体对文化空间的认知和改变文化空间发展行为进而引发文化空间变化。关注新时期城市文化空间变化有助于及时掌握文化空间发展状况, 进而为文化空间发展配置更优的资源与政策, 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建设。

【关键词】: 文化产业; 文化空间; 变化特征; 发展模式; 驱动机制; 成都市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7) 02 - 0114 - 10

DOI: 10.15957/j.cnki.jjdl.2017.02.016

文化空间最初出现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特指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1-2], 如表演艺术、仪式、节庆活动等。其后, 被社会学者界定为富含象征、符号、价值、情感、记忆的场所^[3]。地理学者称其为文化区, 是某类相似文化现象、特征与生活方式的地区。随着城市文化经济迅速崛起, 空间日渐“文化经济化”^[4], 政策制定者、规划师、开发商及学者将文化空间泛化为

¹ 收稿时间: 2016 - 07 - 31; 修回时间: 2016 - 10 - 21

基金项目: 湖北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7004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571155、41171143)

作者简介: 刘润 (1987—), 男, 安徽肥西人, 博士,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学。E-mail: liur@hubu.edu.cn。

通讯作者: 杨永春 (1969—), 男, 陕西白水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与规划。E-mail: yangych@lzu.edu.cn

各类文化设施（书店、图书馆、博物馆、广场、公园等）^[5-6]、文化场所或区域（文化产业园或集群、祠堂庙宇、古城、街巷、旅游地等）^[7-10]，具有物理性（空间实体）、社会性（空间活动）和感知性（空间情感）等普遍特征^[11]。可见，文化空间越来越成为现代城市空间的重要构成，并在当前文化投资与消费不断膨胀、城市更新与改造不断推进、城市形象与品牌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一类显著而又独特的城市发展现象。

这一现象迅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城市新近出现的各类文化空间进行了跟踪研究。在国外，1960年代后，随着一些欧美国家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以及文化休闲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博物馆、文娱/文创中心、艺术家聚集地等一批新文化空间相继诞生。美国社会文化学者沙朗·佐京（Sharon Zukin）是较早关注这些文化空间发展的学者之一，从1982年的《阁楼生活：城市转变中的文化与资本》到1995年的《城市文化》，均为这方面的经典之著。之后此类文化空间迅速在世界各国相继出现，并成为解决城市危机和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12]，因而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如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韩国光州的亚洲文化中心城、奥地利维也纳博物馆区、法国巴黎非主流艺术区、加拿大多伦多酒厂等^[13-16]。在我国，1990年代末以来，各项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迅速转变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助推了城市文化空间的新发展，这与之前的行政指令式发展存在本质区别，对此学者们既从整体上对新出现的文化空间就其区位、分布/分异、类型/结构进行描述性、统计性分析（即发展格局问题）^[17-25]，也具体分析某一文化空间的构建（规划、建设）、发展、运营与管理（即发展模式问题）^[26-33]。

国内外现有研究均较好地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艺术与商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一般特征与规律。然而，相对而言，当前研究缺乏整合不同类型的城市文化空间，进而从整体上揭示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状况。事实上，文化空间的发展还与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城市更新改造、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等重要问题休戚相关，研究文化空间发展可为当前我国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基于此，本文以1990年代末以来城市文化建设发展成绩显著的成都市为例，深入探讨城市文化空间的变化特征，厘清城市文化空间变化的驱动机制，以此把握我国城市文化空间发展一般特征与规律，这对于指导文化空间规划建设、配置更优的政策以及促进文化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域与数据获取

1.1 研究区域

成都是古蜀国的发源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90年代末以来，成都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被誉为我国最具发展活力与潜力的地区之一和“亚太最佳外商投资战略城市”。其中，文化经济在国家、四川省及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迅猛发展，据统计，2004—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0%，高于全市15%的经济增速，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6%，也因此成都一跃成为我国知名的文化休闲之都和旅游胜地。此外，成都市文化经济还不断与公共服务、商业、艺术、文创产业、旅游业等多种业态、需求紧密融合，促使城市文化空间呈现出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新的发展态势。成都市文化空间发展是199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典型，同时又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通过对其研究既可基本把握新时期我国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一般情况，又可为全国其他城市的文化发展提供借鉴。为聚焦研究问题，选择成都市绕城高速以内的主城区和邻近的区县作为研究区域（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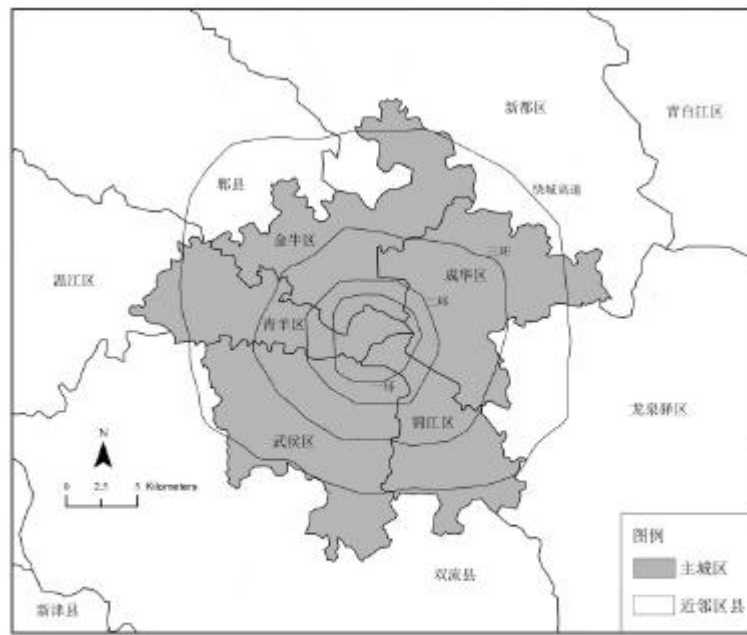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区域
Fig.1 The study area

1.2 文化空间内涵的再界定

对文化空间进行研究前需对其概念、类别进行重新界定。概念上，人类学者偏向文化活动或事件的举办场所，社会学者强调体现价值、意义的场所，地理学者强调共同文化属性的人群所占据的地区，城市规划学者强调文化设施或街区。类别上，不同学者依据不同标准对文化空间进行了分类（表1）。然而，整合当前人类学、社会学抑或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对文化空间的研究，不难发现关于文化空间的界定存在这样的问题：概念强调重点不同，难以衔接；类型划分标准多样，难以统一；空间边界较为模糊，难以明确；空间尺度大小不一，难以对比。这些均不利于对文化空间的统一、整体分析。本研究涉及的文化空间主要指具有特定文化意义（记忆/纪念、信仰/宗教、交流等）和功能（生产、消费等）场所或区域，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语境下，由于更加注重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因此文化空间类似于文化项目区，而历史上的文化空间更偏向其文化意义。在类型划分上参考了李伟东的分类，总体上将文化空间分为公共性、消费性与生产性三类文化空间。其中，公共性文化空间主要由博物馆、广场、艺术馆、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构成，涵盖了史内卡夫提及的大部分文化设施和李伟东提及的现代演绎空间、文化展示空间和文化活动空间；消费性文化空间以文化消费为主，包括商业文化空间（文化商业街、文化商业区）、旅游文化空间（文化景区、主题公园），李伟东提及的传统历史文化空间大多数已成为商业文化空间；生产性文化空间以文化生产为主，包括政府、企业和艺术家个人创建的艺术文化空间（文化艺术区）和政府、企业主导的产业文化空间（文化产业园），这基本等同于李伟东提及的创意文化产业空间。这种分类体系整合了表1多样化的文化空间类型，也直接点明了现代城市文化空间的三个重要属性——公共性、消费性和生产性，因此，具有一定的分类意义。据此，笔者结合成都市文化空间发展实际，选定了公共文化型、商业文化型、文化艺术型、文化产业型和旅游文化型五类文化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而公共文化型文化空间又以变化最为显著的博物馆最为代表。

表1 文化空间分类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space

文献依据	分类标准	具体类型
史内卡夫,1997	设施类型	现代艺术馆、城市广场、公园、艺术区
王承旭,2006	空间尺度	文化意象空间、文化分区、文化片区、文化设施
张敏,2007	形成时间	历史文化空间和现代文化娱乐空间
李伟东,2011	空间功能	创意文化产业空间、传统历史文化空间、现代演艺空间、文化展示空间、文化活动空间、信仰文化空间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5]、[34-36]整理。

1.3 数据获取

关于每类文化空间的构成,笔者采用重点调查法,而非采用普查式调查(博物馆除外),原因有两点:第一,相关部门缺乏现成的关于本研究所需的文化空间类型的统计;第二,研究重点是揭示新时期文化空间的变化,对于缺少统计的文化空间,通过对重点文化空间的调研,能够较好地达成目的。调研主要开展于2013年9~10月、2014年4~6月,具体流程如下:①前往成都市文化局、旅游局,将本研究目的与文化空间的分类体系告知20余位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填写成都市不同类型文化空间的构成。②根据工作人员的填写结果,邀请分管业务负责人核实,并围绕文化空间的建设发展进行半结构访谈。③前往不同文化空间调研,收集规划性、政策性等材料,在此过程中采用了链式调研法,即先经由单一或少数个案的信息来源,经由研究过程中的不断举荐而获得更多信息来源。④调研中部分文化空间无法获取其相关资料,则通过访谈相关研究领域的高校教师或再返回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补充。最终,笔者选择了90个文化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表2)。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与沟通,五类文化空间的构成既有数量优势,满足研究的样本量要求,也能较好地代表多个类别,如商业文化区涵括了改造型、依附型和仿建型三种类型,文化艺术区包括自发集聚型与规划引导型两类等^[37]。因此,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较强的可靠性,通过对其研究能够较好地展现新时期成都市文化空间的新发展。

表2 研究对象
Tab.2 The research objects

类型	典型代表	数量(个)	构成结构
博物馆	成都市博物馆	49	国有馆、行业馆、民办馆
商业文化区	宽窄巷	15	改造型、依附型、仿建型
文化艺术区	蓝顶艺术基地	6	自发集聚型、规划引导型
文创产业园	红星路35号	13	国有资本主导型、私有资本主导型
旅游文化区	欢乐谷	7	配套服务型、政策推动型、节事活动型
总计	-	90	-

2 成都市文化空间的新发展

2.1 1990年代末以前的文化空间发展情况

1990年代末以前,文化空间更多作为一种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国家意识形态载体,是城市治理、国家政治的重要工具,更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构成,如成都茶馆在1950年代曾一度被当作旧社会“黄赌毒”及资本主义的滋生地遭到压制^[38]。

国家尤为重视文化空间的宣传与教育属性，而非其经济属性，因此文化空间均由政府按照行政计划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这可从《中国统计年鉴 1981》中得到证实：1950—1978 年国家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值为 84.5%，地方和企业的投资仅占 15.5%。即便 1978 年后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但受国家文化政策限制，也无法参与文化领域的建设发展。此外，1990 年代末以前国家倡导集体主义，注重物质生产，家庭消费中的文化消费受到严重压抑，如 1990 年成都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 1 680.77 元，其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仅 29.86 元。这必然导致私营性、消费性文化空间发展困难重重。

因此，1990 年代末以前，成都市文化空间发展缓慢，类型单一，以博物馆、公园、影院、剧院、剧场、广场、宗教场所等公共文化空间为主（图 1）；数量也较少，1990 年成都市仅有 8 家博物馆（2013 年底共有 110 家）。其中，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机关单位的文化空间自然由政府管控，影院、剧院、剧场等一批理应以市场为主导的文化空间也需服从指令安排，文化空间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受到严重干扰。在此背景下，文化空间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性构建，成为一种僵硬的空间产品，难以突破制度与环境束缚获得新生。

2.2 1990 年代末以来的文化空间发展特征

2.2.1 类型多样化与功能复合化

1990 年代末以来，发展市场经济成为核心任务，政府对文化空间的管控逐渐弱化，文化空间开始广泛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因而类型迅速分化。成都市文化空间类型不再仅局限于公共型，商业型、产业型、旅游型等层出不穷，且不同类型下的文化空间构成也更加丰富多样，如作为公共文化空间重要构成的博物馆，涵括陶瓷玉石（汉陶、瓷器、玉器）、雕刻艺术（根雕、木雕、石雕、微刻）、家居生活（家具）、服饰文化（蜀绣、刺绣、鞋、丝绸）、文化、姓氏、园林、医药、军事等诸多主题。此外，文化空间功能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化功能，在 market 需求的驱动下融合了更多的休闲娱乐功能。博物馆曾作为教育、宣传与展陈空间，如今逐渐开辟出新的与市场对接的消费化、体验性场所；商业文化空间将引导、培育与满足市场需求作为核心目标，以历史文化街区为载体，开发旅游、消费、休闲、娱乐等功能。文化艺术区、文化产业区与旅游文化区也逐渐认同旅游、商业等功能对增强其实力、获取政策支持、形成品牌效应的重要意义，并开始在其建设与发展中不断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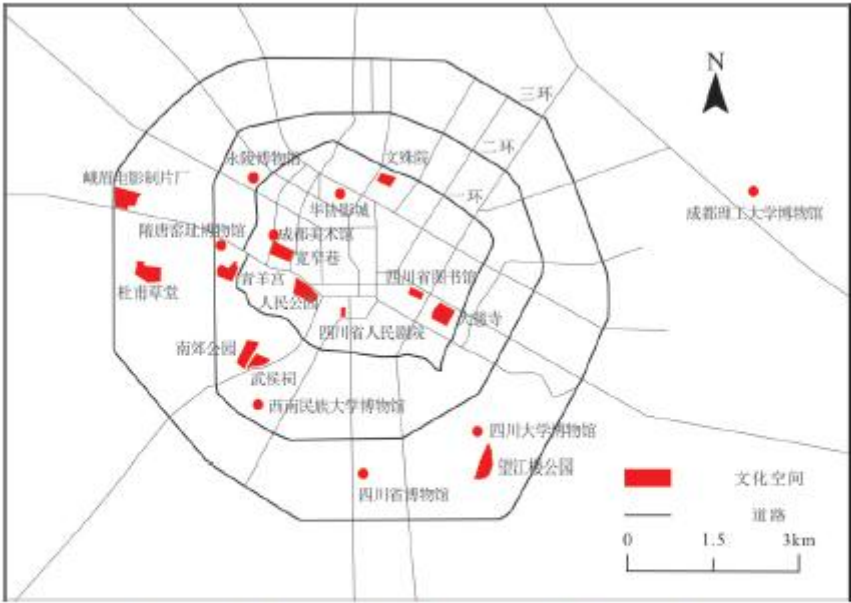


图2 成都市主要文化空间分布 (1997 年)
Fig.2 Distribution of main cultural spaces in Chengdu in 1997

2.2.2 区位选择市场化与政策性

文化空间的区位选择除受特定场所制约外，市场化趋向显著增强，政策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由绝对管控转向适度引导（图3）。博物馆集中分布于历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的青羊区与武侯区，占博物馆总量的近70%。但近年来，不少民办博物馆的区位选择呈现市场导向，这与其同时具有公共性和营利性的属性密切相关，如易园园林艺术博物馆拥有茶园、婚庆、餐饮、园艺、婚纱摄影等市场业务。此外，政策引导也改变着博物馆的区位选择，如为建设“博物馆之城”，成都市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引导在城郊地区建设民办博物馆集聚中心。商业文化区为接近市场消费群体，集中位于人口密度与客流量最大的一环内，占商业文化区总量的70%以上。文化艺术区基本位于自然环境优良、房租低廉的绕城高速（四环）外围，这既有艺术家减小创作时环境干扰和租金压力的诉求，也有政府发展文创产业的政策引导，如锦江区政府引入蓝顶艺术基地为“三圣花乡”增添旅游特色和文化内涵。文创产业园多位于三环以内经产业结构调整闲置厂房较多的青羊老城区和东郊地区^②，因为多半有优惠的政策支持。旅游文化区处于地价相对较低、有大幅土地可供开发且有政策支持三环以外地区，尤其集中于被成都市政府确立为“成都市中心城区北部副中心”的“北改”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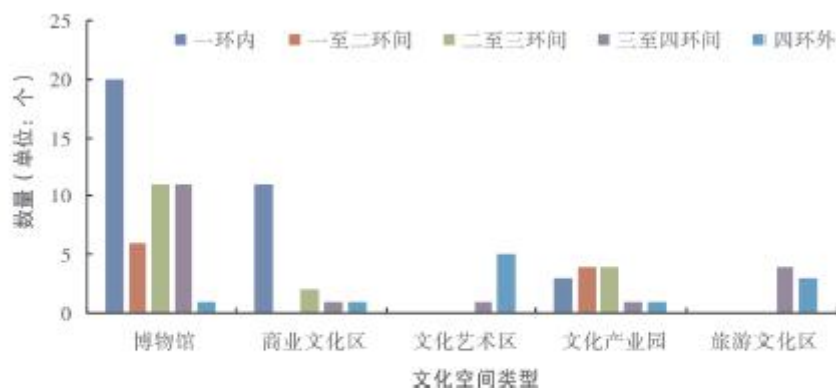


图3 文化空间的分布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spaces in Chengdu

此外，文化空间的区位选择还需要考虑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以选择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具体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共生型文化空间的区位选择，即文化空间发展需借助同类或异类文化空间之间的正外部性或规模效应共同发展，其中，同类以博物馆集聚最为常见，如四川省博物馆周边集聚了若干民办博物馆；异类常表现为商业文化空间依托公共文化空间的知名度、人气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如文殊坊依托文殊院、太古里依托大慈寺等。第二种，竞争型文化空间的区位选择，即同类文化空间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需分散布局以降低竞争，这以旅游文化区最为显著，因此成都市旅游文化空间的分布最为分散。

² ① 东郊地区为建国后国家为发展工业在成都东部地区布置的“三线建设”与“三线调迁”之地，1990s后，东郊地区的多数企业、工业陷入困境。为优化工业发展、提升城市形象，2001年8月成都市政府决定调整东郊工业结构，即迁出一大批运营困难的工业企业，腾出大片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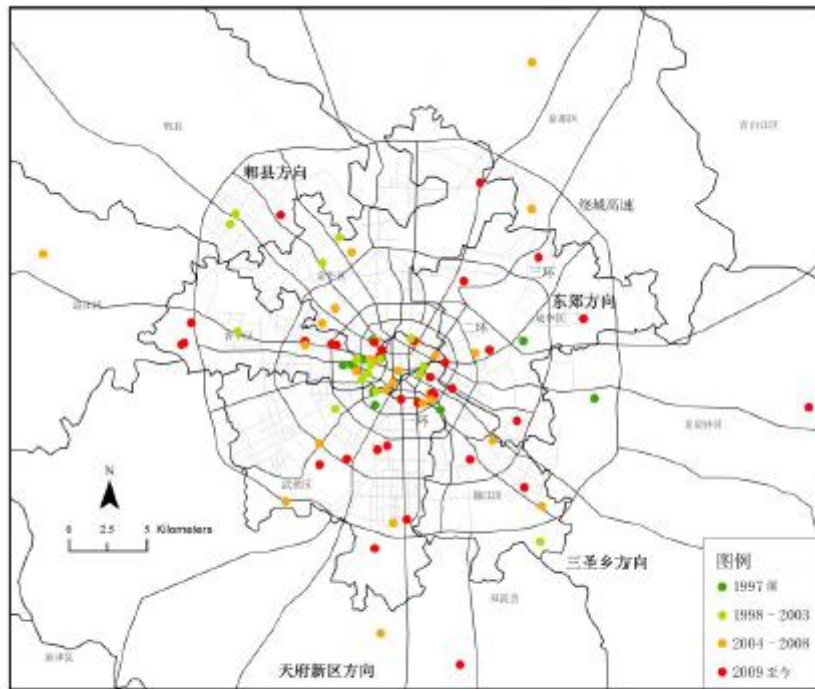


图4 成都市文化空间扩张

Fig.4 Expansion of cultural spaces in Chengdu

2.2.3 发展阶段性与差异性显著

1990 年代末以来，成都市文化空间数量迅速增加，并由市中心向城郊阶段性扩张（图 5）：①1998—2003 年，依靠历史文化资源扩张，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青羊区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扩张区域，形成了一批博物馆和经旧城改造而来的商业文化街，共计 17 个文化空间；②2004—2008 年，文化发展的限制性政策开始松动，文化空间迅速向周边区、县扩散，各类文化空间都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 27 个文化空间；③2009 年至今，文化发展上升至城市战略层面，文化空间一方面在城市中心“插缝”发展（如民办博物馆），一方面在城郊大规模扩张（如商业文化区、文化产业园和大型旅游文化区），共形成 37 个文化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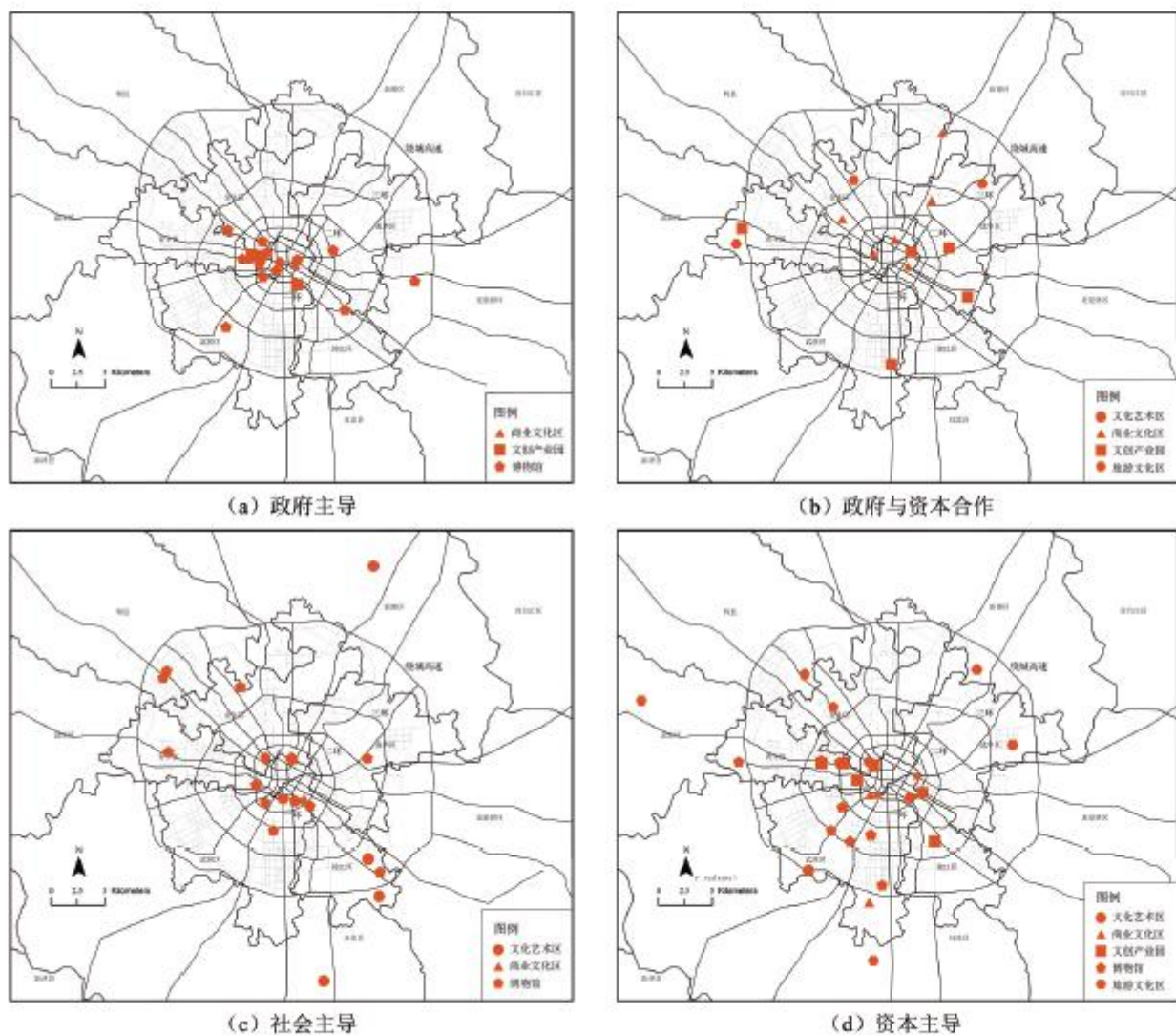


图5 成都市文化空间发展主体
Fig.5 Stakeholders of cultural spaces in Chengdu

文化空间发展存在类型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人”效应下热衷于追求具有直接经济利益的城市开发项目^[39]，这导致成都市博物馆和文化艺术区在2005年前的建设与发展较为被动，较少获得政府的财政拨款与政策支持。2005年后，随着文化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表3），各类民办博物馆、文化艺术区快速发展，成都被誉为“博物馆之城”、“艺术第四城”。除了类型上的差异，空间上也存在差异。主城区目前正处于内城更新改造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期，文化创意产业被确定为先导产业，各类文化空间深受政府认可和支持，发展形势良好；而近邻区县则处于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时期，不断承接从主城区转移出来的工业、制造业、物流业等第二产业，文化艺术经济以及文化休闲娱乐发展环境尚不成熟，文化艺术区和文创产业园发展阻力较大，如新都区北村艺术区仅存活了两年，其后因物流园、物流大道的建设而被迫关闭。仅一些大型旅游文化区由于对区县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带动作用而备受重视。

表3 近年来成都市主要文化政策

Tab.3 The main cultural policies in Chengdu in recent years

类型	主要政策	文号/时间
意见类	《关于奋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意见》	成委发[2010]20号
	《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加快发展的意见》	成委发[2010]22号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意见》	2011年
	《关于深入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成委发[2012]12号
规划类	《成都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成委办[2007]7号
	《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2)》	成办发[2009]64号
	《成都市民办博物馆发展规划(2010—2015)》	2010年
	《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2年
	《成都市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14—2020)》	2014年

2.3 1990 年代末以来的文化空间发展模式

2.3.1 市场与社会主体不断增强

1990 年代末以来，文化空间发展涉及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参与文化空间发展的利益主体不断增多，由最初的政府向资本（开发商、集团公司、企业等）和社会（私人、非营利型组织与机构等）拓展。成都市文化空间发展主体已形成政府主导（21 个文化空间）、政府与资本合作（15 个文化空间）、资本主导（32 个文化空间）与社会主导（22 个文化空间）等多样化的主体结构。不同主体主导的文化空间发展具有显著的类型与区位差异（图 5）：①政府主导的文化空间主要集中于二环内的主城区，以博物馆和商业文化区为主，体现着政府在促进内城更新、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增加财政税收中的垄断地位。②社会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文化空间相对分散，更加体现出文化空间发展的社会性与市场性，其中社会多主导民办博物馆、文化艺术区等规模小、投资少且易于操控的文化空间，资本广泛参与各类文化空间，但不同实力资本下的文化空间在其区位、等级与规模上具有明显差异：相对较弱的资本多参与民办博物馆、文化艺术区发展，较强的资本则参与内城商业文化区发展与城郊大型旅游文化区开发。③政府与资本合作的文化空间由于同时具有良好的政策基础与资金支持，扩张能力更强，多出现于新近开发且存在较大市场空缺的地区。

事实上，成都市文化空间发展主体的更替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尤其在商业文化区和文化艺术区的发展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图 6）。商业文化区由于较强的社会经济带动性，最初由政府主导发展，但政府能力较为有限，为实现更好发展，政府逐步引入资本和社会主体，如宽窄巷、大慈寺等项目最初均由政府主导，其后逐步移交市场开发。文化艺术区最初由社会主体开发，随着发展形势不断好转，逐渐引起资本和政府的注意，并开始参与、制定优惠政策等。洛带艺术粮仓是洛带镇政府为促进古镇旅游开发而与开发商共同打造的文化艺术区，而在此之前，成都市各级政府从未主导过文化艺术区开发。



图6 文化空间开发模式的演化

Fig.6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model of cultural spaces

2.3.2 空间构建方式日趋个性化

空间构建方式体现特定时期、特定群体对空间的利用方式、态度与需求，是一种历史性、社会性的构建。计划经济时期，空间被视为僵死的、消极的、被动的、标准化的生产生活载体，文化空间构建多依据相关标准、规范或构建者的经验，较少考虑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也较少对空间本身进行多样化、精细化布置。这一时期的成都市博物馆就是如此，其内部空间配置简单，一般程序化地分为展览区、办公区、库藏区等，普遍缺少对外服务、经营性区域；此外，博物馆周边的空间鲜有开发利用，导致博物馆与社会经济发展“绝缘”，孤立存在。当前，空间作为一种灵活的、积极的、主动的、个性化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得到认可。在市场的驱动下，文化空间被认为是可参观、可展示^[40]、可体验的，文化空间构建方式尤为注重通过空间的分割、设计、装饰来提升空间的使用效果与使用效率，其结果是文化空间的商品化、产业化、主题化或迪斯尼化。博物馆不再是绝缘体，而是密切联系社会、经济的空间纽带；内城区建筑、厂房进行了风格化开发利用，不再是静态化的保护或任由闲置，如宽窄巷、太古里、文殊坊、东郊记忆等既体现了传统建筑特色、街区纹理，也在产业上、功能上构成“精挑细选”、“优化配置”；不少新建的文创产业园、旅游文化区为最大化其空间价值，精细设计了其内部每个空间单元，如西村文创园邀请了著名建筑师刘家琨进行空间设计，具体有川西建筑风格、庭院式布局、非标准化楼层、环形跑道、多样化业态划分等（图7）。此外，还有欢乐谷、龙潭水乡风景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等均采取了这种市场化的、个性化的空间构建方式，空间的多元价值正不断得以释放。



图7 西村文创园的空间构建
Fig.7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West Village

2.3.3 开发模式不断演化与完善

1990年代末以来成都市文化空间开发模式整体呈现出专业化、节事化与网络化开发的态势。专业化开发主要体现在文化空间开发主体的专业化，不少公司组建文化与旅游的业务部门，拥有文化、旅游、商业等专业化的开发经验，如成都市政府组建成都文旅集团开发宽窄巷，组建成都传媒集团开发东郊记忆等。节事化开发主要体现在开发主体越来越重视节事活动带动与营销，从成都市政府到各类开发商，均积极举办、引入或借助各类节事、会议等，国际层面的有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国国际美食旅游节、《财富》全球论坛、世界华商大会等，城市层面的有金沙太阳节、音乐节（大爱音乐节、热波音乐节、摇滚音乐节）等，具体到文化空间层面的则更加丰富多样，如旅游节、摄影展、创意市集、文化讲堂、茶会、比赛等。网络化开发主要

体现在借助新闻、博客、微博、微信等多种网络媒体迅速抢占市场，进行全方位宣传与营销，尤其在自媒体时代，开发主体对网络平台的开发十分重视，甚至将游客、作家、摄影师、艺术团体也纳入其网络化开发体系之中^[41]。

3 城市文化空间新发展的驱动机制

1990年代末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不断深入开展各项制度改革，其核心为行政力量相对弱化及市场力量日趋增强，这些宏观的制度改革通过改变文化空间发展的主体、改变主体对文化空间的认知和改变文化空间发展行为，最终导致文化空间的变化。

3.1 制度转型与文化空间发展主体

制度转型彻底改变了文化空间的发展主体，基本形成了政府、资本与社会三类主体。1990年代末以前政府是文化空间发展的核心主体，这主要受当时计划经济发展思路的影响，尤其文化空间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与公益性。2000年后文化产业的产业地位得以明确，国家明确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其后在多份国家文件中出现了鼓励社会资本、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在成都，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先后组建一批大型文化、旅游、传媒类的集团公司（如成都文旅集团、成都传媒集团），对不少文化事业单位进行转企改制（如成都艺术剧院公司），培育了众多本土文化投资公司（如成都文创投资公司、成都高投置业公司、成都中冶文投置业公司），对外则积极引入各类从事文化、旅游发展的集团公司或地产公司（如华侨城集团、中房集团、太古地产、远洋地产）。此外，文化体制改革也导致较多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脱离原有的国有文化体制系统，这些人连同大批高等院校的文化艺术师生共同构成了成都市文化空间发展最重要的主体。

3.2 制度转型与对文化空间再认识

制度转型促使文化经济活力的释放，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渐凸显，与此同时文化空间的价值也正重新被认知：文化空间不再是计划经济时期负面的、消极的“消费主义”或机关单位或纯粹公共场所的象征，而成为城市转型与发展的一种积极的生产性、建设性要素。政府将文化空间视为提升政府形象、增加政绩工程、提高财政税收、进行地方营销的重要载体；资本将文化空间视为资本增值的重要工具，因为文化空间具有“化腐为朽”的魅力，可以制造出投资垄断^[42]，可以提高资本投资的附加值^[43]，更具有政府赋予的优惠用地、税收与财政政策；社会组织或个人将文化空间视为增加经济利益、促进文化传承保护和改善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在成都，文化空间正成为制度转型期城市空间转型（旧城改造、城乡统筹）、经济/产业转型、文化转型（文化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城市生活）、形象转型（旅游/文化/创意/美食城市创建）的重要抓手，天府广场的八大文化场馆、民办博物馆集聚中心等就是最直接的体现。然而，处于转型期的不同地方政府对文化空间的认知存有差异，一般而言相对偏远的城郊地区对文化空间价值的认知较主城区小，因为其可通过承接主城区转移出的制造业、工业迅速发展，这便是成都新都区不支持文化艺术区发展的重要原因。

3.3 制度转型与文化空间发展行为

制度转型由于重新界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范围和职能角色，因此对文化空间发展行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①政府方面。既从一些文化空间发展中部分退出，引入更多市场和社会主体，给予税收、用地、财政等方面的优惠，扮演招商引资者，同时又推行城市企业主义，增强政府行动力，促进对文化空间的规划引导，出台众多支持文化、旅游、商业、服务业发展或融合发展的政策，扮演城市精明管家。这体现了制度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角色的转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转变，事实上，这一转变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与协商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等重建是政府主导开发模式失败后向市场妥协的结果，市场主导的文化空间开发也会因面临各种障碍而不断与政府协商获取政策支持与保障。②资本方面。制度转型赋予了资本更多的发展权限，一方面密切关注政策导向，根据政策调整发展行为，如是否投资文化空间、投资何种类型文化空间以及文化空间区位选择等，另一方面根据市场原则以项目运营方式，对文化空间进行空间规划、建筑/景观设计、功能/业态配置，

积极组织和举办各类节庆、比赛、会议、展览等，这使得文化空间迅速被资本化、商品化。③社会方面。制度转型为社会主体参与文化空间发展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社会主体类型较多、实力较弱、参与目的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他们既根据政策动向和市场需求调整自身文化空间发展行为，也根据自身兴趣习惯进行发展。前者如成立民办博物馆；后者如建设艺术村，为避免政府和资本对其文化空间的干扰和侵占，文化空间多选址于相对偏远的城郊，这又导致文化空间呈现非制度化、边缘化等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计划经济时期，文化空间多作为国家机关单位被政治性构建，国家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文化空间的经济性、社会性被抑制，因此城市文化空间类型、功能单一，且建设、运营与管理直接受行政管控。1990年代末以来，文化空间越来越成为现代城市空间的重要构成，开始为经济性、社会性构建，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城市形象宣传、城市竞争力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呈现出诸多新的变化特征。为深入解析文化空间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本文以成都市为例，深入探析1990年代末以来其文化空间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

①文化空间发展特征方面：1990年代末以来，城市文化空间的类型越来越多样，旅游、消费、休闲、娱乐等功能不断融为一体；区位选择的市场化趋势逐渐增强，受政策影响由绝对管控转向适度引导；文化空间逐渐由市中心向城郊阶段性扩张，但同时由于受政策和区域发展水平影响，还存在着文化空间类型与区域上的差异。

②文化空间发展模式方面：1990年代末以来，政府不再是文化空间发展的唯一主体，各类资本与社会主体迅速成长，形成了多元化的主体结构，不同主体主导的文化空间发展情况差别显著；空间构建方式在市场的驱动下尤为注重对空间的分割、设计、装饰等，个性化趋势不断增强；开发模式整体呈现出专业化、节事化与网络化开发的态势。

③文化空间发展驱动机制：1990年代末以来的制度改革改变了文化空间发展的主体结构，促使了不同主体对文化空间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不同主体的文化空间发展行为出现显著变化。主体的变化、认知的变化和行为的最终导致文化空间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而转型期本身所具有的过渡性、阶段性也更加促使文化空间发展的多变性。

不难预测，文化空间在今后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将继续凸显，也将会呈现出更多的新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及时掌握城市文化空间发展情况，跟进投资、规划、引导、配套等服务，为文化空间发展配置更优的资源与政策，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建设。然而，由于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走访式调研，难度较大，加之近年来城市文化空间发展日新月异，对于文化空间新发展的梳理与概括难免存在不足。此外，文化空间的新发展对城市产生的影响需要明确和深入研究，只有清晰地把握这一点才能更加针对性地指导其今后发展，而这也将是笔者今后继续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 [1] 李玉臻.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 [J]. 学术论坛, 2008(9): 178 - 181.
- [2] 向云驹. “论文化空间”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5(3): 81 - 88.
- [3] 关昕. “文化空间：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J]. 民俗研究, 2007(2): 265 - 272.
- [4] Terkenli T S. Landscapes of tourism: towards a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of space?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2, 4(3): 227 - 254.
- [5] 哈德罗·史内卡夫. 都市文化空间之整体营造：复合使用计划中的文化设施 [M]. 台北市：创兴出版社，1985.

-
- [6] Wynne D. Cultural quarters [C] //Wynne D. The culture industry: the arts in urban regeneration. Aldershot: Avebury, 1992.
- [7] 陈晓西. 四川北路: 遗失的文化空间 [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2(1): 59 - 64, 76.
- [8] 李滨, 杨达. 芜湖古城的文化空间特征及再生策略——兼论古城保护规划中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定位 [J]. 规划师, 2012, 28(2): 44 - 49.
- [9] 鲍懿喜. 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特性 [J]. 人文地理, 2012(4): 49- 53.
- [10] 李星明, 朱媛媛, 胡娟, 等. 旅游地文化空间及其演化机理 [J]. 经济地理, 2015, 35(5): 174 - 179.
- [11] Lai L Y, Said I, Kubota A. The Roles of Cultural Spaces in Malaysia's Historic Towns: The Case of Kuala Dungun and Taiping [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 85: 602 - 25.
- [12] Hall P. Creative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Urban Studies, 2000, 37(4): 639 - 49.
- [13] Shin H, Stevens Q. How culture and economy meet in Sou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5): 1 707 - 1 723.
- [14] De Frantz M. From cultural regeneration to discursive governance: constructing the flagship of the museumsquartier Vienna as a plural symbol of chan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5, 29(1): 50 - 66.
- [15] Vivant E. How underground culture is changing Paris [J]. Urban Research & Practice, 2009, 2(1): 36 - 52.
- [16] Mathews V. Incoherence and tension in culture-led redevelop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 38(3): 1019 - 36.
- [17] 周尚意, 姜苗苗, 吴莉萍. 北京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6): 127 - 133.
- [18] 李凡, 朱竑, 黄维. 从祠堂视角看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流变和社会文化空间分异 [J]. 地理科学, 2009, 29(6): 929 - 937.
- [19] 李山石, 刘家明, 黄武强. 北京市音乐旅游资源分布规律研究 [J]. 资源科学, 2012, 34(2): 381 - 392.
- [20] 张蔷. 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现状、布局及发展对策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8): 1227 - 1236.
- [21] 薛东前, 刘虹, 马蓓蓓. 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J]. 地理科学, 2011, 31(7): 775 - 780.
- [22] 薛东前, 黄晶, 马蓓蓓, 等.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格局及热点区模式研究 [J]. 地理学报, 2014, 69(4): 541

- [23]金珊,闫安,周麟,等. 空间感知视角下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研究——以深圳市为例[J]. 建筑学报,2015(3): 19- 23.
- [24] 张宝秀,张妙弟,李欣雅. 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重构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13(2): 17- 23, 51.
- [25] 朱媛媛,曾菊新,韩勇. 基于信息流的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空间结构研究 [J]. 人文地理,2015(1): 105 - 111.
- [26] He SJ, Wu FL.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5, 27(1): 1 - 23.
- [27] 周建军,朱嵘. 城市文化创意空间的塑造——上海城市文化发展与世博会规划的思考 [J]. 规划师,2008, 24(1): 29 - 32.
- [28] 姜文锦,陈可石,马学广. 我国旧城改造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上海新天地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2011, 18(10): 84 - 89.
- [29] 高红岩. 电影旅游集群的文化空间生产研究 [J]. 人文地理,2011(6): 34 - 39.
- [30] 黄斌,吕斌,胡垚. 文化创意产业对旧城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北京市南锣鼓巷旧城再生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2012, 19(6): 86 - 90.
- [31] 廖开怀,李立勋,张虹鸥. 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重构——以星巴克为例 [J]. 热带地理,2012, 32(2): 160 -166.
- [32] 郭文,王丽,黄震方. 旅游空间生产及社区居民体验研究——江南水乡周庄古镇案例 [J]. 旅游学刊,2012, 27(4): 28 - 38.
- [33] 刘晨,朱竑,安宁. 文学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凤凰古城为例 [J]. 旅游学刊,2014, 29(7): 68 - 76.
- [34] 王承旭. 城市文化的空间解读 [J]. 规划师,2006, 22(4): 69 -72.
- [35] 张敏,刘学,汪飞. 南京城市文化战略及其空间效应 [J]. 城市发展研究,2007, 14(5): 13 - 18.
- [36] 李伟东. “世界城市”视角下的北京文化空间建设 [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4): 14 - 17.
- [37] 刘润. 资本、权力与地方:成都市文化空间生产研究 [D]. 兰州:兰州大学,2015.
- [38] 王笛. 成都茶馆业的衰落——1950 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 [J]. 史学月刊,2014(4): 85 - 96.
- [39] 王玲,王伟强. 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J]. 城市规划汇刊,2002(1): 40 - 44.

[40] 贝拉·迪克斯. 被展示的文化: 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1] 刘润, 杨永春, 王梅梅, 等. 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旅游地视觉景观生产研究——以成都宽窄巷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6(3): 136 - 144.

[42]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43] 黄斌, 吕斌, 胡垚. 文化创意产业对旧城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北京市南锣鼓巷旧城再生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9(6): 86 - 90.